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四四期 ——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4c)

【史海钩沉】	毛泽东从批江青到批邓小平的嬗变 (上)	郑仲兵
【抗拒遗忘】	寻找“反革命”者	卫 毅·乔 芊
【前朝旧事】	纪登奎夫人王纯谈文革	秋石客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毛泽东从批江青到批邓小平的嬗变 (上)

• 郑仲兵 •

在中共高层人士中，曾被毛泽东加意看重者，唯刘少奇、高岗、林彪、邓小平。人说，毛泽东是空前的君王。被他看重谓之伴君。伴君如伴虎——爱之致其生，恶之致其死也。刘少奇、高岗、林彪、邓小平这四大金刚都曾被毛宠爱过，后来又相继遭到毛的嫌恶。高岗、刘少奇、林彪因毛之恶先后致死。邓小平的殊遇在于，两度被毛垂爱，又两度遭毛垂恶。正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大难而不死。然而，邓却没有因两度遭恶而思善，在毛之后，堕落为中国又一代专制独裁者，即自诩的——“第二代核心”。本文要叙述和解析的是，文革后期邓小平第二度幸遇毛的垂爱，又遭垂恶的始末。本文拟分四个部分：一，邓小平的复出；二，江青的抵制；三，毛泽东批江青；四，从批江到批邓的嬗变。

◇ 邓小平的复出

邓小平正式复出的时间是1973年3月10日。当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其实，毛泽东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走）之前，就有重拾邓小平的表露。

1971年9月10日，毛南巡为整肃林彪造舆论，与浙江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就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长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他与陈毅夫人张茜谈话中，除了把文革中整陈毅等老帅们的责任推给林彪外，还讲到：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得悉林彪死讯后，两次上书毛泽东，都恳请“为党做点工作”、“补过于万一”。特别是1972年8月3日的信，他在批判林彪的同时，又作自我批判，并发誓“永不翻案”。

毛于8月14日将邓信批给周恩来，并写下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毛特意指出邓的几大功绩：（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有历史问题”。（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四）邓“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最后说：“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周恩来明白，这是毛起用邓小平的信号。

1972年11~12月，根据中央布置，邓小平偕夫人先后赴井冈山和赣南参观考察。1973年2月20~22日，邓小平带全家从发配地江西回到北京。3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邓小平正式复出。3月28日，周恩来、江青、李先念见邓小平。29日，毛泽东在住处见邓小平。4月12日，邓小平出席周恩来为西哈努克和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中公开亮相。

邓的复出纯属毛的意志使然。我以为，在中共宗派体系中，邓本来就是毛派中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在苏区遭整肃时是“毛派头子”，而且建国以后一直是毛独裁的最主要、最得力的执行者，且有发明创造之功（如反右、反修）。1952年，邓小平是第一个奉调中央的地方诸侯，并任负责政务院常务工作的副总理；1956年中共八大，毛起用他为总书记，意在扼制周恩来和刘少奇。在根本利害问题上，邓从来没有得罪过毛。在文革中，毛把他和刘少奇绑在一起，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事实上是“第一线”的二号人物。但毛一直声言他与刘少奇“有区别”，而且始终由自己（通过汪东兴）直接控制。重新起用邓小平对毛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林彪事件以后，毛更把邓看作手上的一张王牌——虽然是一张赌注风险极大的牌。毛重新起用邓小平，不仅是因为看重他，也不仅是为补林彪覆没后的空缺，更主要的还在于钳制并替代周恩来。

林彪死后，1972年1月中，毛病垂危，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五个月后，周也查出患膀胱癌。但周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使经受文革折腾的危残局面，有了明显的改观。他对经济秩序的治理，反对泛滥的“极左思潮”，可以理解为尔后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先河。尤其周在外交政策上的调整成效和中美关系长足的进展，形成所谓“功高盖主”之势，不能不令毛产生疑忌。毛、周在数十年共事中，从来是同床异梦，毛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周。但由于毛无法填补周处理繁杂国务政务的强势，由于周待人处事（包括对毛）的谨慎周全，还由于周在党内外的强大影响力（所谓“反周民必反”），毛曾几度倒周而未果。毛泽东认为：现在应是时候了。一是愤懑难却。历史上对周的积怨；从九大到九届二中全会周与林的合拍；周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反映出对文革的态度（如批林的极“左”）。二是时机成熟了，刘少奇既倒，林彪已除，特别是邓小平已然复出，即可以除周。去周决意已下，更加速了邓小平登上中央权力平台的步伐。

1973年7月3日，毛与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无端大肆攻击周恩来主持的外交工作：“忽然来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同日，邓小平在中共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1月17日，毛召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对周提出批林彪“极左思潮”，以及2月15~19日与基辛格会谈时说，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大加挞伐。11月间，毛指示中央政治局多次批周对美外交的“投降主义”，江青指责周“迫不急待地要取代主席”。12月12日，

毛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训斥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不议政”，叶剑英主持的“军委不议军”。冲着周恩来说：“一打起（仗）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同时，毛提出让邓小平当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并接受邓小平建议，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调动。

为了考验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毛点名让他参加12月14日政治局批周会。邓小平说周：“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已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邓对周画龙点睛的诛心之论，道出毛对周的欲加之罪，令毛兴奋不已，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翌日，毛偕邓小平见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在京军区司令员说：“我们现在请来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又对邓说：“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建议，由周恩来起草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并于12月22日一直下达到党内外群众。

从1973年底到1974年初，毛泽东一面布置批林批孔（即批周），一面让邓小平一步步重登中共权力核心地位。这不能不惹怒了毛的政治妻子——江青。江青以及张春桥、姚文元等文革派核心人物自认为（而且事实上也是），自批《海瑞罢官》以来，打倒刘少奇及其“司令部”，打倒林彪及其“反党集团”，批林整风以及1973年事实上就开始的批儒批周三次“路线斗争”中，为毛冲锋陷阵，功勋卓著。对于毛如此看重并加权于邓小平，他们心里是无法平衡的。

诚然，毛泽东不是不想重用江青、张春桥们，但作为权谋家，他十分明白，九届二中全会“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他已将林彪及其党羽剪除，且把文革祸害归罪于林彪，但他毕竟看到人们对文革的厌倦和反感，以及江青、张春桥这些文革派核心人物的不得人心，用毛的话说是“积怨甚多”。毛不能不面对现实，做出必要的妥协，如放宽一些政策，压制一下江、张等人的势头，起用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等。

曾记否？1967年发生在武汉——外国人称之为“兵谏”的7·20事件，虽被弹压下去了，但毛还是向军方作了妥协，并将文革三员虎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以“毁我长城”的罪名牺牲掉。林彪事件后，毛自然也要做出妥协性的调整，以邀买人心，平息人怨。而起用邓小平，就是他得意的一着棋。然而，江青及张春桥等，却很难理会毛的心境和思路。他们还沉浸在冲锋陷阵、功勋卓著的艰辛与喜悦之中。林彪事件以后，他们的权势虽然大大膨胀了，但苦于权重而位低。他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毛泽东对邓小平如此重用。

◇ 江青的抵制

为发泄胸中不平，施加压力以改变毛的决策，江青在1974年接连有两次大闹腾。

一次是针对毛提名邓小平为代表团团长，参加4月9日召开的联合国六届特别会议（按常规应由周恩来出席）。1974年3月20日前后，毛泽东在周恩来、江青皆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王海容让外交部以部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提名邓小平为团长。几个月前因外事而痛遭毛挞伐的周恩来，于3月24日即签署同意，并报毛泽东（周主管外交部）。毛即行圈阅。未料，江青坚决反对，并大闹政治局，几次强令外交部撤回报告。为此，毛曾表示，“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说明江的意见和情绪对毛不是不起作用的。由于周恩来的周旋，政治局委员（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知道是毛的决定后，都一致表示拥护，只有江青保留自己意见。3月27日，毛寄书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被迫给毛回信，表示拥护。4月3～5日，政治局讨论邓小平赴联大

发言稿等事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皆称病缺席，明显表露出他们的情绪。4月6日，邓小平离京赴美。周恩来抱病偕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群众代表数千人到机场欢送。4月19日，邓返京，周等及数千群众又到机场迎接，并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邓出席联大的前前后后，江青与邓小平的抵牾，已然公开化，其与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宽容和支持，形成鲜明对比。这也为尔后毛、江、周、邓四角关系的发展做了铺垫。

江青的第二次闹腾是针对毛泽东1974年国庆后提出筹备四届人大，并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策划了“风庆轮事件”，采取打周（恩来）及邓（小平）的策略。江青等人借批主张向国外买船、租船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攻击周恩来，并及协助周工作的邓小平。10月14日，江青在刊登有“风庆轮问题”的《动态清样》做了批注，并给在京政治局委员写信：“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阶级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批示同意江的意见。周恩来批示“已阅”，毛泽东和邓小平只是划了圈。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例会。江青又提出风庆轮问题，邓小平未发言。江青质问：“小平同志，总理住院后，国务院由你主持工作，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邓小平没有回答。江青又说：“你不讲话不行，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你要表明态度。你要向政治局讲清楚。”邓回答：“我已经圈阅了，我还要调查。”江又逼问道：“你对‘洋奴哲学’持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回答：“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呀！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赞成你的意见吗？”邓小平复出，第一次给江青下马威，江岂能容忍，于是大吵大闹。经李先念劝阻，邓忿忿离场。事态的发展，也许正是江青们所期待的。是夜，江青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研究对策，认为邓已“跳出来了”，可借势整他。决定由王洪文抢在10月20日邓小平将陪同丹麦首相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去向毛“告状”。

10月18日（即次日）上午，王洪文飞抵长沙。王对毛诉说：“我这次来，是冒着风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王还挑动说：“总理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同志。”意在利用毛对周的“心病”，引到邓的身上。10月19日，江青又两次约见将于20日同邓小平赴长沙的毛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讲了政治局和周恩来在医院搞“串联”等情况，要她们向毛报告。

老谋深算的毛泽东，当然不会为江青这般“小儿科”的诡计所挑动。虽然毛不怀疑江的忠诚，而且也希望中央保持一种相互牵制的权力关系。但他毕竟还希望江青能和邓小平在中央有某种协调，从而为他已处于进退维谷的“文革”踏出新径。事情的结局是，两天后（应是11月22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两位联络员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了他的“最高指示”。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总理还是总理”；二、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三、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中央的人事大权，是操控在毛一个人手中，只有他说了才能算数。二、周已病入膏肓，“总理还是总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无非借用他的名义来缓冲和平衡中央已出现的两股势力和权力的纷争。三、王洪文虽是扶不起的“阿斗”，到这个时候，毛还是把他摆在接班人的位置，可见毛对文革势力的倚重。四、让邓出任第一副总理，这是毛让邓小平复出后的既定方针，让邓复出的本意就在于替代周。12月23日，周恩来抱重病与王洪文赴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毛泽东明确指定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党、政、军五大要职加于一身。毛还对周交代：“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去顶。”至此，毛事实上完成了以邓代

周的置换。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京举行，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7日，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名列第一（即第一副总理）。2月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上，重弹毛泽东对邓小平评价“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以邓小平为首”。2月2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周恩来关于国务院分工的报告。至此，走完了邓替代周的全部组织程序。

◇ 毛泽东批江青

江青的一再闹腾多少打乱了毛以邓代周的部署，加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哄而起的助阵，反而进一步暴露了文革派的有恃无恐，不顾大局。这逼使毛不得不对他们进行颇有限度的批评。然而，此事在“四人帮”垮台后，却被官方大力渲染夸大，把这有限的批评说成是毛为两年后“粉碎四人帮”立下的“遗志”。这里有必要把毛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做一个解析。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批江材料有三类（限1974年内，1975年放在第四部分分析）：

- 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正式收录的毛给江青的信或在江信上的批文。
- 二，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人见毛后的记录，或毛参加政治局会时的谈话。
- 三，“两案”中有关当事人的交代。

这三种材料，都是有实证价值或参考价值的。但是需要分别情况，加以分析论证。

“两案”有关当事人的交代材料，多属于回忆的材料，而且是在特定环境中的交代。它的可信度和准确度都有待考的余地。

毛与周、邓、李、华等人的谈话，传达出来，虽不会有多大出入，但毛作为权谋家，诡计多端，反复无常，谈话中之所言，都会带有权谋意味，如正话反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等等，都要从历史环境，特别是事件发展的全过程去考量。

《文稿》中给江青的亲笔信或对江青信的批文，应是权谋成份最少，真情实感最多的。《文稿》中收录1974年毛给江的信共五封，毛在江给他信中的批文共三段。从中可以看出，毛带有情绪，但只是夫妻间的恩怨，没有把她当作异己。如2月9日毛在江送的材料信封上写道：“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按：意思是“我身体不好，别烦我，有事到政治局会上去说吧！”）

3月20日的一封信：“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按：这是颇有情绪的一封信。毛表示拒绝见她，为什么？不清楚。此段关键的话是：“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江有什么特权？狐假虎威，有恃无恐也。不顾大局，不谙策略，目空一切，我行我素。毛显然为她着急，恨其不懂事，恨铁不成钢，是自家人的一种失望和担心。）3月27日给江青的信：“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二十天后的4月17日，毛又给江青写了两封信。其一：“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

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面（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从毛信中可以看出，江青信中是发了牢骚，表示出某种悲观失望，甚至表示要撺挑子。我们看到毛对江青柔情的一面，看到他对自家人的担心、鼓励和教诲。这封信可以说是十分真实地反映出毛对江的情感、态度和认识。

其二：“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要。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按：信是同日写的，这封信可能未曾发出。）23日，江青给毛信，报告她到天津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和到小靳庄的情况，要求到胜利油田后再回北京。毛于次日即在她的信上批复：“可以延长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10月19日，江又写信给毛。毛又于次日批复：“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以上二批复，都有针对江的缺点进行批评之意，但都可见关切爱护之情。江青的活动，包括她的行踪，都要向毛报告请示，可见他们联系之紧密。

11月12日，江青给毛写信，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建议。毛于当日即在她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此前不久，江青大闹政治局并与邓小平吵崩了，江如此不识大体，不顾大局，令毛感到恼火、难堪、失望。写此批语，毛显然在气头之上。但是这些批语并无敌意，都是大实话，且点到江青秉性的要害。诤言也。11月19日，江青给毛写信，信上诉说自己“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又于次日复信：“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信中是在向毛抱怨自己无职无权。九大后江青进政治局，但没有分工安排具体工作，这是事实。为什么？不清楚。是林彪、周恩来有意限制她，还是毛的意思？亦不清楚。毛所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换句话说，就是要江青在把握国内外形势时还要监视中央的政治动向，这是其他人不能替代的特别工作。别人怕她，惹不起她，在她面前唯唯诺诺，其实怕的是毛。别人也是把她看作毛的总监。毛在中共高层中没有真正相信的人，如果说有，那么也只能是江青了。文化革命就是毛、江的连体所为，是毛江夫妻店之所为。

毛要江读李固给黄琼书，看似在批评江青，其实透出毛对她的信任、爱护和期望。毛无非告诫江青：“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译成白话是：高峭尖突的东西容易被折损，皎洁白净的东西容易被玷污，《阳春白雪》这样高雅的曲子能与之唱和的人一定很少，负有盛名的人，其实能力未必就能和他的名声相称。要她不要因清高、孤傲、卓尔不群而致孤立，脱离大多数。

毛给江青的信，和对江信的批文中，从来没有批评江搞“小宗派”，更没有出现过“四人帮”一类的字眼。这样的话都是在特定的场合上说的，都带有权机的意味，是说给人听的。似乎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的对话。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异乎寻常地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般情况下他不参加），并在会上批评了江青。批评的话被选摘收进中共中央1976年10月18日下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中。文字如下：“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

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官书上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点出‘四人帮’的问题。以为两年后粉碎这个集团准备了有利条件。”似乎毛先知先觉到需要他去为“粉碎四人帮”创造条件！实在是荒唐可笑！

我们即便从官方这个寻章摘句的材料中，也无法得出官书的结论，我们看到的是：

一，告诉江青，别人对你有意见，你并不知道。

二，“设两个工厂”是讲别人对江青的具体意见。不是本质问题，而是方法问题，简单粗暴的问题。

三，“改也难”是说江固执，个性太强。

四，“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是指政治局成员中的关系，政治局中本来就存在着派别——文革派和老官僚派——毛岂能不清楚，他的感情倾向也是不言而喻的。他只是要他们“注意”，没有说就是“小宗派”了。这话是收买人心的话，与其说是说给“四个人”听的，不如说是说给“四个人”以外的人听的。

五，说江“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形同废话。无非是要撇清关系，让自己处于完全的主宰地位。毛即便这么说了，人们也无法判断江能不能代表毛，什么时候能代表毛或不代表毛。江为什么有恃无恐，因为她是毛的妻子，她有条件向毛吹风，也有条件得“毛”气之先。1967年1月陶铸事件中，毛刚刚痛斥江青“眼高手低”，无组织无纪律，拉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但转眼间，又是毛把陶铸打入十八层地狱。荒唐的是，总有人无视毛江政治夫妻唱妇随的本质，贬江袒毛。

如果我们离开上述断章取义，寻章摘句的材料，再去看记录得比较完整的毛江对话，就不能不为之惊讶。

毛对江：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呢。江笑着回答（按：注意江的笑）：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按：毛在七个月前曾赠言邓：“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钢铁公司”。江分明借机调侃毛和邓）毛：当众说的！江：说了算！毛：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又对众人）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是不大好呢。江：不大好就改。毛：你也是难改呢。江：我现在钢铁公司不开了。毛：不要就好。江：帽子店，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弄不清楚是谁搞的。我一定特别注意，主席放心。（按：江没有就毛范，话锋一转，又攻击起外交部和周、邓）

听着两人的对话，政治局委员们都不作声。毛泽东说：“他们都不吭声呢。”周恩来于是替江青辩解说：“有些也是我们搞出来的。1月25日的大会上，（按：指根据毛布置召开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目的是批周。）我把江青同志的信都念了，（按：江在信中批评批孔“深入不下去”，对林彪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当然大家就比较注意了。”毛指着江说：“此人一触即跳。”江青却往周身上一推：“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毛泽东说：“我讲你的脾气。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江青指着纪登奎：“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她指的是纪搬进钓鱼台住（按：江近乎在戏弄毛）。毛泽东再次说：“你那里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以上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382～382页）

原来，毛泽东这番轻描淡写、东拉西扯又浑浑噩噩的不知所云和江青嬉戏般的对话，就是官方文献所谓毛泽东对江青或“四人帮”的严肃批评和沉重打击。当年，中共高官们视毛之一

言如九鼎，甚至可以决定对自己的生杀予夺。可是，江青则不然。面对毛的批评，她不当回事，而且就要在众高官面前表演她的不当回事。如果毛真的想整肃江青，江何能逃得过？世人总以最大的义愤口诛笔伐江青或“四人帮”，还要引用毛对江的所谓批评来张势。殊不知，江之有恃无恐的秘密就在毛，江的恶行之根就在毛，没有毛就没有江。

我们从文革历史中倒是看到另一面的现象：谁与江青过不去，毛就放不过谁，谁就会遭惹祸。“二月逆流”的老总老帅如此，陶铸如此，后来的林彪亦如此。现在（1975年），邓小平又将重蹈覆辙。世人总是低估了毛江政治夫妻一体的政治力量。

◇ 从批江到批邓的嬗变

下面笔者要引述并评说《邓小平年谱》记录的1975年间和1976年春季邓小平复出后，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至再度下台的历史过程。

1975年1—2月，比较平静。

1975后3—4月，江青、张春桥又搅起批“经验主义”风潮，说它是“当前主要危险”，看似批周，实则打邓。

3月1日，新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大讲“反经验主义”。

4月1日在他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中提出：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4月4日、5日，江青在两次讲话中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4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一再提出反经验主义，要求政治局讨论。（以上参看《邓小平年谱》上37页注文）从1975年4—5月，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祭起“三项指示为纲”的大纛，展开全面整顿工作，更由被动挨江青的攻击，转为主动向江青开战。

1975年4月18日

下午，（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之后，向毛泽东反映自三月初以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郑按：邓具体说什么，不清楚。）

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所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郑按：前引号的话，显然不可理解成是批江青或“四人帮”。须知，毛并没有放过“经验主义”，说它也是“修正主义”，没有说批经验主义不对。后引号中的话，似有点江青的意思，但没有理由说它就是批江青的，毛的玄机待考。自三月份以来“批经验主义”，显然不会是江青、张春桥的自以为是，应是毛的部署，起码也是闻毛之风而动的。）“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按：邓小平上当了，1956年邓小平为毛之“引蛇出洞”阳谋的总指挥，此时竟也身不由己地被毛“引蛇出洞”了去。）

1975年4月27日

（邓）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贯彻毛泽东4月23日批示精神。会上，和叶剑英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四人帮”宗派活动等问题提出尖锐质问。（按：“质问”谁？江青还是毛？真是昏头昏脑，错估了形势，以为到了“清君侧”的时候了）江青被迫作了检讨。（按：江向毛检讨是“周瑜打黄盖”！）会后，王洪文以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为名致信毛泽东，诬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并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按：王洪文岂有如此“斗胆”，可见事先布置的影子）29日下午，邓小平前往305医院，向周恩来汇报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1975年5月3日

深夜，（邓小平）前往毛泽东住处，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按：这三条看不出就是说江青他们。“要马列不要修正”，这是最主要的一条，可以肯定不是说江青的，我看是说周恩来，也是警告邓小平。第二条，“要团结不要分裂”，可以理解成说江青，但也可以理解成说邓、叶。第三条，“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似在说江青他们，但更像在点邓小平他们——这就是王洪文向毛汇报邓、叶批江，点出“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何况，我们从来还没听说过毛批江搞阴谋诡计呢！）毛泽东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按：这是毛对邓到他那里告江青的回答和结论。人们看这段话，往往忽略了前两句：“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这是毛所强调的，已带有指责的意味。不知邓是真听不出还是假听不出！接着说“但有问题要讲明白”，强调的是“讲明白”。之后连续讲“上半年解决不了，”显然不是讲要“解决”江青或江青问题，而是接上句的“问题要讲明白”。而且说到“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说明在毛看来，并不是要急于解决的问题，或者根本不算是什么问题。这段话，后来被华国锋、被邓小平、被官史所歪曲是显而易见的。）

1975年5月4日

晚，（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核对毛泽东5月3日讲话内容，研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和如何传达毛泽东4月23日批示问题。

1975年5月8日

晚，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会议商定待邓小平访法回国后再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邓小平5月12日晨乘专机赴法访问，5月18日上午返回北京。）

1975年5月19日

上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军委第13次常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汇报。（按：这是邓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天，头一天上午回京，下午到医院看了周恩来）邓小平说：我们不但要提社会主义，还要提爱国主义，你没有社会主义觉悟，至少要有点爱国主义。有些人连爱国主义都没有了，还搞什么社会主义？（按：这是批评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人，是对江青批经验主义的回应）你们回去传达时，就说这个话是我讲的。不外乎被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按：明显地带着情绪，不只是冲着江青他们说的，因为能够打倒他的只有毛。）

1975年5月21日

上午，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在会上指出：搞社会主义建

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按：邓小平抬出总路线来压批唯生产力论者，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975年5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落实毛泽东5月3日讲话精神，对江青等进行批评。指出：主席这篇讲话（5月3日），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在谈到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的批评时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围攻。（显然这番话是江青等四人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因为开的是政治局的会）其实，40%也没有讲到，有没有20%也难讲，（按：此话言过其实矣，是拿大帽子压江青他们。因为毛5月3日讲话时就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邓没有接受毛的警告，现在正在“小题大做”了）因而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的问题。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这没有什么过。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11月会议上提出“第11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按：邓的口气够厉害的！一副整肃、质问的口气！）会上，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也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按：好家伙，吴、陈也转向了）邓小平走在江青的前面。

1975年5月29日

晚，（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钢铁工业座谈会。在讲话中首次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思想。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按：毛何时提出“三项指示”？怎么凑出三项来？）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今年3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

1975年5月下旬

（邓小平）阅周恩来致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周在信中写道：“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的春桥同志在总政3月1日召开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这段话旁批注道）：“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按：周故意略去江，邓还要把她点出，毛阅后作何感想？周用“请教”一词，有趣、有趣！）

1975年6月3日

叶剑英就邓小平5月27日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继续批评、质问江青等。在政治局成员集中批评“四人帮”的形势下，王洪文、江青在会上被迫作了一些检讨。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政治局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按：邓藉势毛4月23日批示和5月3日讲话，连续发动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斗争，特别是他的发言，让人看到“破釜沉舟”的气慨。邓不可能想不到，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在触犯毛老人家。联系毛反击后邓的“熊”样，如何解释他此行此举呢？难也，难也，还没有明白就里）

1975年6月初

江青到邓小平家中谈话。邓小平后来说：江青找我，毛主席叫她来，她不敢不来。谈得不好，她吹她的一套，水平不高。（按：谁知道毛怎么叫江青去找邓小平。邓说她“谈得不好，她吹她的一套”，说明江没有认错，还坚持她的一套。）

1975年6月7日

下午，（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马科斯后，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批评江青等人的情

况，并反映他们到最后仍否认有“四人帮”。毛泽东肯定这次政治局会议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按：早在5月3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是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现在说“把问题摆开了”，还是同样的意思；不能理解成是肯定邓等对江青的批评斗争。）还提出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希望邓小平把工作干起来。（按：“风向快要转了”，指什么？要邓小平把工作干起来，指什么工作？都看不明白）邓小平向毛泽东表示：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按：话何以说得这么没劲，可见邓已听出毛的话音了。）此前，江青曾向毛泽东反映中央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

晚，（邓小平）和王海容、唐闻生前往305医院同周恩来长谈。周恩来、邓小平要王海容、唐闻生将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四人帮”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按：周写信，邓见毛不是将批评会的情况都向毛报告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托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报告呢？似可说明周、邓的报告，没有从毛那里讨到明确的回应）

1975年6月12日

下午，（邓小平）在上海同马天水谈话。说：主席最近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有新的指示，听到了吧？（按：颇有逼供的意味）你们这里批经验主义很凶哟。你想想，经验主义在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省市代表人物是谁？发展下去就要找代表人物哟。春桥同志在政工会议（按指1975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看过吗？里面有批经验主义的啊！我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啊。（按：近乎诱供）老干部刚开始敢抓一点工作，这样一批，谁还敢抓呀？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按：联系现实批资产阶级法权正是毛的意思、毛的思想）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谈话后，马天水即把情况告诉王洪文、姚文元。以后，马天水又应王洪文要求，将邓小平同他的谈话整理成文字材料上报王洪文。（按：邓小平的威逼利诱、苦口婆心竟没有打动马天水这个“老干部”，他不仅把谈话的内容告知王、姚，而且还给王写了白纸黑字的材料，决心把“宝”压在“四人帮”一边。说明，马多少是得知了最高统帅毛的“战略部署”，而王洪文的动作，也证明了毛的做法）

1975年6月28日

江青就毛泽东1974年以来多次批评写出检讨。

1975年6月30日

周恩来将江青写的检讨批给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表示欢迎这一检讨，（按：周是最识时务者）并建议将检讨送毛泽东批阅。

1975年6月底或7月初

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传阅周恩来批转的江青的检讨。阅后批注“同意总理的建议”。毛泽东圈阅了此件。（按：没有批语）

1975年7月1日

凌晨2时，（何以要在“凌晨2时”？）叶剑英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持人选（主持人是王洪文，王前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之际，向毛提议，在他离京期间，政治局会议由叶剑英或邓小平主持），致信毛泽东：“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按：老滑头也）毛泽东批示：“同意。”

1975年7月初

（邓小平）到毛泽东处谈话。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控制的文艺工作，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按：何时有过“百花齐放”？）别人不能提意

见，不好。在邓小平指出现在文艺不活跃时，毛泽东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毛什么情况不了解，毛这番话，岂不意在煽邓之烈焰！）

1975年7月9日

（邓）同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谈话。传达毛泽东对“四人帮”控制的文艺工作的批评意见。指出：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按：毛批评意见中未提百家争鸣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毛主席最近对百花齐放问题和文艺工作问题作了指示，我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准备讨论一次。又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同时，要求政研室搞一些调查研究，收集近些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以供政治局讨论时用。次日，胡乔木召集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开会，商议调查研究的题目、方式和分工等问题。这以后，国务院政研室通过调查研究，收集和上报了近些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违背“双百”方针的一些材料，向中共中央、毛泽东转呈了一些信件。（按：毛和邓只谈了文艺问题，并没有让他去收集江的问题，邓不仅把它扩大到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而且还布置收集、上报。邓要捅毛家后院的马蜂窝。）

1975年7月18日

作家张天民分别致信毛泽东、邓小平，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电影故事片《创业》提出不同看法，并建议重新上映该片。张天民致邓小平的信，由胡乔木转给邓小平。随即，邓小平将信转交毛泽东。“文革”影片《创业》讲述石油战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故事。

1975年7月25日

（约过一星期）毛泽东在张天民给邓小平的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1975年7月26日

胡乔木将电影《海霞》主创人员谢铁骊、钱江给毛泽东的信（按：文化部把《海霞》说成“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交给邓小平。邓小平很快就转送给毛泽东。

1975年7月28日

邓小平阅北京京剧团一工作人员提出对“右派分子”一律赦免摘帽建议的来信，作出批示：“此件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国锋、吴德同志对此事了解一下，以便在政治局谈一谈。”

1975年7月29日

毛泽东在邓小平转来谢铁骊、钱江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按：此批示见《年谱》74页注1）

1975年7月30日

晚，根据毛泽东对电影《海霞》主创人员谢铁骊、钱江来信的批示，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文化部负责人和《海霞》摄制组成员参加的审片会，审看《海霞》的两个版本——最初送文化部审查的片和修改后的片子。接着，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决定在全国上映修改后的《海霞》。

1975年7月

邓小平同毛泽东谈话。汇报说：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

望。夏粮丰收了，秋粮长势不错。还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在汇报到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时，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在表示有人讲一讲，有好处，没坏处时，毛泽东说：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按：邓显然去讨毛的话，但毛没有为他说好话。邓只好解嘲，什么“有好处，没坏处”。结果毛来了句“无非是挨骂，我历来挨骂”。显然带有情绪。也可能就是冲着邓来的。）

1975年8月2日

邓小平阅汪东兴报送的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电话请示记录，作出批示：“电话覆：可在长影本单位传达，其他单位不传达。”7月29日，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转报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关于学习和传达贯彻毛主席“七二五”重要批示的请示报告》。（按：邓发动对江的“火烧”够急的。江得知会作何反应，毛看到会作何感想？）

1975年8月8日

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按：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并入五七艺术大学）音乐教师李春光贴出大字报，揭露并驳斥（文化部及其上司）对影片《创业》的无端责难。大字报的抄件经邓力群、胡乔木送邓小平，邓小平转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按：毛未云何以为用，更没有对大字报的内容加以肯定。）

1975年8月12日

邓小平阅江青本月10日来信，得知江青自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连队搞了三个试点，还把这三个连队的指导员分别派往湖南株洲和天津农村，准备搞一年的试点；待任务完成后，江青准备和姚文元、陈锡联、纪登奎一起接见他们。随即，在信上作出批示：“三个指导员蹲点时间已久，目前正在整军，他们以早回部队为好。建议仍由江青、文元同志处理，回部队后，由北京军区谈话，锡联、登奎同志忙，可以不参加了。”（按：邓小平开始直接拆江青的台，且把陈锡联、纪登奎和她拉开。可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了。）

1975年8月13日

江青在邓小平批件上批意见：“如果部队没有特别困难，建议他们三位还是按主席的指示，在基层坚持一年为好。”（按：江青与邓小平叫板，还用“主席指示”来压邓。）

1975年8月14日

中午，邓小平接到江青要秘书打来的电话：完全同意小平同志批示，取消留基层一年的建议。（按：只过了一天，江的态度完全变了，表示“完全同意”邓的批示。何以如此，意味深长。）

1975年8月13日

刘冰等联名请邓小平转呈致毛泽东的信，揭发迟群（按：还有谢静宜）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邓小平收信后即转交毛泽东。（按：邓小平不知向毛转送了多少封“告状信”和材料，有的信和材料是有意组织人写的。矛头直指江青和文化革命，颇有逼宫之势。邓小平的主动进攻之势，似到此为止，下面应是毛和江青们的反击了。）

◇ 毛评《水浒》，邓陷入进退两难

1975年8月14日

毛泽东同陪读人员谈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书中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按宋江搞哪门子“修正主义”？显然在借古说今！）当天，姚文元得知消息后致信毛泽东，提出将毛泽东的评论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和有关宣传、出版部门，

以“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按：姚文元接得如此之快，岂不事先安排好的？毛还批示“同意”，更可见《评水浒》的“项庄舞剑”之意了。30年前本人就听一位长辈说过，解放初邓小平主政西南之际，就曾自诩宋江，还戏封属下一百单八将，如李井泉为豹子头林冲，阎红彦为霹雳火秦明，胡耀邦为大刀关胜等等。倘若属实，毛拿《水浒》宋江说事，就更不足怪了。）之后，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谈话。本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按：江青点了题。所谓“现实主义”，所谓“架空毛主席”，显然是毛的意思。）

1975年8月21日

邓小平在驻地会见胡乔木，接受他转交的萧劲光本月20日致邓小平的信。邓小平后将信送交毛泽东。信中揭发7月14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刁小三的逻辑》、上海《学习与批判》第七期发表《八路军的“样子”》的文章攻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按：说明“海派”已开始行动了。）下午，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篇目的会议。在胡乔木问前不久毛泽东评《水浒》的指示是针对什么、是不是特别有所指时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后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绝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按：胡乔木的鼻子很灵的，尤其对毛的言行。窃以为，邓是在装糊涂。）胡乔木协助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

1975年8月26日

邓小平约胡乔木谈修改《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按：“提纲”是7月中旬胡耀邦到中科院工作后，主持起草的。）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你同耀邦他们一起议论一下，要亲自动手修改。科学院是个有争论的单位，所以每一句话都不能轻易去说，无论说什么都要好好考虑，要慎重。你转告耀邦、李昌，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按：邓小平这个“钢铁公司”现在也言“慎重”了。还要胡耀邦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可见他是有警觉的，心态在改变。）

1975年9月1日

邓小平阅杭州大学教授夏承焘来信，作出批示：“夏我不认识，反映的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印送政治局同志参阅。”夏承焘在信中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是相当数量的旧知识分子，由于历史或思想原因而受到冲击，建议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到基层。（按：此信就没有转给毛了。）

1975年9月5日

邓小平将一封关于要求进一步落实文艺工作政策的来信批送中央政治局成员参阅。这封署名“天津市文艺界一个普通党员”的来信说：近几年来文艺界出现的一些事情很难使人理解，特别是落实政策问题，文化部过去十几个副部长，一个都不用，司局长也放在一边，还有大批老演员也闲着；有人一说就是“十七年”如何如何，好像文艺界17年就没有好人了。（按：此信也没有转给毛）

1975年9月13日

邓小平会见送来江青在大寨讲话材料的胡乔木、吴冷西。在他们谈到江青讲话中称“宋江架空晁盖”是影射邓小平“架空毛主席”（按：没有毛的意思，江岂能乱说，而且是在邓要参加的15日召开的全国学大寨会议的前三天。）时，说：真的指我，（按：似恍然大悟！）那要把讲话材料送主席看。不过不能由我送，要通过别的途径。（按：显然已乱了方寸）又说：不要紧，让她说。现在叫喊反复辟的人，自己就是搞复辟的。（按：一句自我镇定、自我安慰的话，但说

得理不直气不壮!)还指出:现在教育方面的问题积了一大堆。国务院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按:教育方面当然问题严重,须知,教育是毛亲自——而不通过江——抓的,迟群、谢静宜都是毛亲自派的。后来事实也证明,毛就是从教育问题上开始批邓的。邓小平在这里说的话,无非是要给身边的秀才们壮壮胆,秀才中的大多数,比邓小平还胆小)

1975年9月15日

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5年的目标来说,(按指用25年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按:邓何以把这次会与七千人大会相比?似用隐喻的方式,强调这次会要用党内“让人说话”、“出气”的做法,来调整和改变文革发动九年的伤病局面。而七千人大会正是他负责筹备和组织的)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的讲话多次被江青的插话打断。

1975年9月16日

晨,邓小平由山西回到北京。审改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随后将文件报毛泽东审阅,并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此事在政治局会议上谈过一次”。“这个问题较大,我想当面得到主席的指示”。“我还有几个重大的人事变动问题,也急需向主席当面请示”。(按:邓巴望见毛的心情可见)17日,审改外交部、中联部《关于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拟同意,略有改动。”随即报毛泽东等审阅。《接待计划的请示》中提出,拟请江青等出席欢迎宴会和专场文艺晚会。(按:是例行公事还是向江放秋波,或试探毛的反应?)之后,毛泽东对两件请示批示:“已办,退小平。”“另,江青不要参加对越活动。”19日,邓小平将毛泽东的批示和《会谈方案的请示》、《接待计划的请示》转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并告传阅后送江青阅。(按:对毛的批示,邓岂不患了迷糊?)

1975年9月19日

下午,邓小平会见前来请示工作的胡乔木。在听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准备写一篇关于全面宣传毛泽东三项指示的文章时,指出:文章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如果写得好,我可以约几个副总理研究一下,再送主席审阅。主席同意了,就交政治局议,政治局批准了,就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按:此时,邓还祈望通过“三项指示”的文章实现转机)

1975年9月20日

下午,邓小平和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施行大手术治疗的周恩来。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前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按:邓后来回忆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我想这应是实情,只不过周的这句话也许还更加重了毛对邓的疑忌。)

1975年9月21日

上午,邓陪同毛泽东会见希思。会谈结束后,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在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作了指示。(按:毛作了什么指示?查毛的年谱或毛传。邓显然在试探毛的反应。)

1975年9月24日

邓陪同毛泽东会见黎笋后,汇报江青在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关于评论《水浒》的讲话情况。(按:是9月12日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不在会议期间。邓在13日和胡乔木等人谈话,

曾认为自己向毛反映江青问题效果不好，想以沈默待之，看来，他还是沈默不住了）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此前，毛泽东在华国锋请示说江青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时，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按：毛真会装蒜！他真是权术高手，让你感觉得到，又说不出，令人到死之前，还不愿意放弃幻想。）

1975年9月27日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的情况和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认为社会上有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按：虽说是毛远新汇报“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但不反映毛泽东的观点才怪呢？毛家的人开始行动了，开始对邓反击了。毛远新说得不错，其实明眼人也都能看出：“社会上有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窃以为不是“一股”，而且多股，除了一小撮文革利益者外，谁人不否定文革呢！）

1975年9月27日

邓小平出席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他仍强调：）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按：他还有意把矛头指向江青和文艺界：）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还说：）不能听到风就是雨。（按：“不能听到风就是雨”，显然是指毛泽东批评水浒，特别是江青所云“架空毛主席”等等。邓在整顿中的所言所行，显然锋芒指向了毛泽东的“文革”基本方针政策。而其手法则是以毛之矛陷毛之盾。毛岂能感受不到，岂不恶之？）

1975年9月30日

邓小平把经过修改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表示不满意，特别提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不曾记得讲过。（按：毛究竟讲过这句话没有？如没讲过，为什么《提纲》要这么写？毛看了《提纲》后，仅仅是“不满意”吗？）

1975年9月下旬

教育部长周荣鑫根据邓小平关于“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精神主持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

1975年10月3日

邓小平在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篇目的会议，强调要学习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文件。吃饭时，同大家交换对前一天晚上看电影《春苗》（按：江青等人肯定的电影）的看法，对影片中批斗“走资派”表示不满。在谈到话剧《万水千山》时说：《万水千山》受到虐待，找不到好的戏院演出。（按：看来，此时邓尚未屈服，《万水千山》或算是邓搞的“样板戏”，但也不怎么样）

1975年10月5日

邓小平阅胡乔木改写、本月4日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名义上报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关于创办《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拟同意，请主席批示。”六日，又在毛泽东圈阅后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请政治局同志传阅后退胡乔木。”

1975年10月5日

王洪文致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并报毛泽东的信，信中写道：“对浙江目前在贯彻中央十六号文件中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特别是对省委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

级派性’提出了些不同看法。我认为浙江原来从上到下，特别是省主要领导同志、地县主要领导同志都存在资产阶级派性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口号会把形势搞乱。”

1975年10月7日

邓小平阅王洪文的信，并写了批语：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如果不对省委支持，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势必会有反覆，这很不利。（按：不难看出邓和王二人在针锋相对地斗法。王是明显地在找邓的茬）同日，根据邓小平领导整顿期间多次讲话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初稿完成。

◇ 毛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0月13日

刘冰等再次联名请邓小平转呈致毛泽东的信，揭发迟群、谢静宜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何人？）、搞非法组织活动的情况。此信由胡乔木交给邓小平，邓小平即转交毛泽东。（按：谢是毛的人，她“攻击”的对象倘是邓，来由不费猜详。邓还要转这封信，还是想为之一搏）

1975年10月19日

晚上，（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夫人等客人后，同陪同会见的李先念谈话，对邓小平转呈刘冰等人的信批评道：）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的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而且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信为什么还要经小平转。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按：戏的正本总算开场了。毛已点题：“当前两条路线斗争”。从江青、张春桥批经验主义、之后毛谈“水浒”，到江青在大寨说邓架空毛，在农业学大寨会上和邓叫板，毛远新向毛汇报对形势的看法，在浙江省委发动群众批派性问题上王洪文和邓公然顶牛，以及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对邓的攻击等等，都是戏前的戏。从现在开始，正式批邓才出台。理由嘛，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我在北京，为什么还要小平转”。于是就可以整人，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当然也暴露出专制独裁者的胸襟）

1975年10月21日

晚，邓陪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和夫人。

1975年10月23日

根据毛泽东本月19日的意见，邓主持召集有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参加的六人会议，和李先念、汪东兴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来信的批评。经过初步讨论，会议一致表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重要，并就如何贯彻提出两个方案。（按：邓从此处于被动招架之势）

1975年10月30日

下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一行。

1975年10月31日

晚，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我有些事须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一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按：可以想见邓当时的心情）

（未完待续）

~~~~~

【抗拒遗忘】

## 寻找“反革命”者

• 卫 毅 • 乔 芊 •

徐星 作家、纪录片导演，曾为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服务员、清洁工，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作品之一，另有代表作《剩下的都属于你》等，此外还拍有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

### ◇ “被反革命”

2012年1月2日晚，徐星在微博上贴出了自己新拍摄的“文革”纪录片片花。片花的第一行字幕是：“2010年，我发现了一些四十多年前的‘现行反革命’犯人登记表。”

两年前，徐星在北京宋庄拍摄纪录片时结识了一位老画家。“文革”期间，老画家在监狱里待了10年，作为“墙报犯”，负责做宣传工作。他拿着一些没用的犯人登记表，在上面临画描。画的背面是犯人的信息。“第一眼看到这些登记表的时候，在视觉上有一种力量，尽管是一张破纸，但你还是觉得它承载的东西特别沉重。”徐星说。这些犯人都是农民。大多数时候，人们所关注的“文革”受害群体是被打倒的干部与知识分子，而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农民在很长时间未被重视。

“这特别适合拍一个纪录片。”这些登记表一共有22张，通过联系，徐星找到了其中的11人。他们当年集中在浙江一个劳动农场接受改造。

这些人所获之罪，如今看来荒诞不经。比如“吹捧刘少奇”的罪名。“都是言论罪，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当时说话不谨慎，被人举报了。”

“文革”奉行的是阶级斗争，假如一个地方没有阶级敌人，说明此地阶级觉悟不高。一个公社挖出一个“反革命”集团就是政绩。每个生产队都得有坏人，没有是不对的。徐星拿出一张登记表，“比如说这个人，他自幼没爹没妈，没有任何保护，不整他这样的人，还能整谁？”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被反革命”了。

### ◇ 对怀疑的怀疑

“林品新在哪住你知道吗？”“请问何山老先生在哪住？”“你是不是胡峻录？”画面上发问的是徐星的声音。纪录片的拍摄者其实就他一个人，他把摄像机夹在腋下，就这么在浙江乡下一路拍过去。镜头里有时候只是一些路在延伸，还有他的喘息。

徐星拍纪录片十多年了。他并不认为影像就胜过文字，只是觉得影像比较直接。在他眼里，写作是一辈子的事，但是记录历史需要抓紧时间。“我要不赶快做的话，这些人都死了。”

对于徐星这一代人来说，“文革”是两辈子都很难表述完的事情。1956年出生的徐星，“文革”开始时正好10岁。

徐星的“文革”，多少有点儿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气息。“但他们是在军队大院里，军队情况是很特殊的，相对来说很稳定，没有受那么大冲击。外面阳光可能挺灿烂，但同时也血腥很暴力。”

这些灿烂的暴力并没有让徐星产生迷恋。他更多的是感到恐惧。听到那些被打者的喊声、棒子声、皮带声，他吓得脸都白了。

徐星是个思想上不安分的孩子，从小就对身边的世界充满质疑，包括“文革”。他住在机关大院里，每天早晨上学前，看着那些他叫叔叔阿姨的知识分子，还有院子里的工人，都拿着语录在唱歌、向毛主席像鞠躬。“我就在想，这些人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吗？”这给少年徐星造成了特别大的困扰。

11岁，徐星随父母一起下放西北，在开往甘肃的火车上，他觉得自己被唤醒了。之前他从未出过远门，没坐过火车，无法看到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不同。“我一上火车，就崩溃了。我们所受的教育，宣传画里的工人都雄赳赳气昂昂，贫下中农系个白头巾，拿着大镰刀，手里抱着麦穗。在火车里一看，没一个我在宣传画里看到的，都特别穷。人之间充满暴戾之气，谁碰了谁一下，就打起来，满嘴脏话。”徐星开始怀疑，自己一直生活在假象里。

怀疑——让徐星感到非常难受。那时的一个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徐星问父亲，能怀疑毛主席吗？“我爸脸都绿了，我从来没见过我爸那么紧张过。他对我说，毛泽东思想是怀疑别人的武器，你能用什么武器来怀疑毛主席？”父亲特别害怕他到社会上问别人这个问题，那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文革”中，对于各种主义的批判，徐星很不积极。这让老师很不满意。与同龄孩子相比，徐星从小就看了很多书。“从小我爸就让我看古希腊罗马神话插图本，太阳神啊丘比特啊。再大一点儿，就看文学名著，喜欢翻看男人怎么给女人送花的段落，小男孩朦朦胧胧的性意识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尽管看了很多书，徐星没敢想“成为作家”这件事。“觉得作家不是一般人做的事儿，多神的人，才能写这么厚一本书啊。”

“文革”中，家里的书都被抄了。他开始跟着批斗的人群，麻木地喊着打倒谁谁谁。老师开始教他们画漫画，怎么丑化刘少奇。再就是学各种红歌，比如“蘸尽东海千顷水，写满蓝天万里云，写不尽毛主席的恩情”。“最聪明的统治技巧就是剥夺你的反抗手段，让你没有手段去反动。1980年代的时候，我体会非常深刻，那些大学生唱来唱去就是那几首歌，都是别人提供给他们的手段，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手段，特别可怜。”

#### ◇ 我的“文革”编年史

徐星抽着烟，正在为搭建这部新纪录片的结构而发愁。他坐在电脑前，给我们看了一些拍摄的素材。

在一个叫山坑村的地方，他找到了一个叫林品新的人。这个村子里的人这些年大多信了基督教，包括林品新。

年轻的时候，林品新在周围几个村很有名，因为他的农活干得特别好特别快，在农村，这就是最大的本事。这个村子里有个姑娘也特别有名，因为长得漂亮。这姑娘的爸妈看上了林品新，觉得把闺女嫁给他会过上好日子。漂亮姑娘勉强从了父母之命，但自己不太乐意，结婚不久就偷偷找了情人。在农村，这是一件特别让人抬不起头来的羞耻之事。两人离了婚。

“文革”来了之后，农民被要求参加批斗大会。林品新在会上看到那些受罪的人，就想着让离婚的前妻来受这个罪。他写了一封反动的信，署上前妻的名字，寄到北京。没过两个月，公安局把这件事情一查，把林品新给抓了。

林品新是这批人里获罪最重的，判了20年，因为是“重犯”，第一年还戴着脚镣。脚镣56斤，还得天天劳动。“这就是‘文革’，多荒诞。”“文革”的事情，徐星听过很多，但这样的事情，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徐星拍片子的时候，特别想找到林品新的前妻，“好奇她到底有多漂亮”。

周明夫是因为在会计室里拿着生锈的气枪玩耍时，不小心对准了毛主席像而入狱。“他老婆特别好，嫁给他的时候20岁，始终不离不弃，在外面等着他。大部分人都是一判就离婚了，这不能怪家属，当时反革命家属是没法生活的。”

徐星在电脑上点击着一段一段的素材。这些农民在镜头前都很宽厚，没有说特别恨谁。“我在浙江农村拍这个，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么好的人，这么本分，中国人太好管理了。”

关于“文革”的纪录片很多，“你怎么将自己的作品与别人的作品区别开来？”

“历史都是有细节的，就像长城上的每一块砖，它都是有故事的，都是人手做出来的。我能做的就是堆砌细节，让那些更有形而上能力的人来做历史的概念。”徐星说。

徐星之前拍过两部不是“文革”题材的纪录片，除了文字之外，他还有电影之梦。“因为咱们从小都看电影，觉得不满意。技术的发达提供了可能，技术越来越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你想去做。那我干嘛不试试？”徐星说，“在拍摄和剪辑的过程里都有享受，这个过程特别美，对自己特别满意，觉得自己真天才，做了一件这么棒的事，但过一段时间就特别空虚，就像妇女生孩子，怀孕10个月，每天期盼，生完就空了。

在《我的“文革”编年史》中，徐星以他给暗恋的女孩写情书为线索，这是他的“文革”自传。为了这部片子的拍摄，他特意把那位女孩从美国请了回来。其实，直到40年之后给她打电话，他才知道这女孩说话声音是这样的。女孩跟徐星不是一个班的，高他两个年级，只是见过，他就喜欢上了她，但俩人从没说过话。“暗恋嘛，憋不住了就写了封信，后来就出事了。”

这位叫颖韬的女孩当年知道徐星。“我在那所中学里非常有名，因为我几乎所有功课都不及格，但我的作文老是被当作范文，在全年级读。数学老师都说，以你的聪明，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考不及格，但我确实不懂，到今天也不懂，不会算，完全不感兴趣，灌不进去。”

他没想过“文革”会结束。“就觉得哪天是头啊，天天那么熬。再加上青春期躁动，特别压抑。”

在这样的压抑中，徐星爱上了颖韬。他老是主动去扫楼道，就是为了去看这个女孩。颖韬也记得，这男生怎么总是在扫楼道啊。她一经过，徐星就不扫了。

徐星把自己对“文革”的怀疑写进了给颖韬的情书里。颖韬收到这封没有署名的情书后，不知如何是好，就告诉了老师。老师和公安局的人比对笔迹，查出写信者是徐星。徐星被带走，在拘留所里关了十几天。那时他15岁，初三。之后他远离了颖韬，直到40年后找到她。面对徐星的镜头，颖韬为当年的举动深感懊悔。

“文革”期间，徐星很多时候是一个游荡者。他扒火车去过银川、包头、青岛。“之前还编个理由请假，后来都不编了。”在青岛时，一位好心的大哥收留他住在家里，当他看到这位大哥的一块手表时，产生了拿走的念头，他最终没那么做。多年以后，为了拍纪录片，他回到青岛，找到了那位大哥，为当年有过那样的想法而忏悔。“文革”时，当他游荡到沈阳的时候，曾经从百货商店里顺走过一把吉他。现在，五十多岁的徐星偶尔会从超市里顺走一包口香糖什么的，他觉得能让乏味的生活有些小刺激。

#### ◇ 困顿的不合作者

《我的“文革”编年史》的商业运作挺成功，拿到法国，赚了钱，但参与的人有好几个，到他手里就仁瓜俩枣，最后只得到几万块钱。

徐星如今在北京北四环外租了两居室房子，租金有一半是他90岁的母亲支付。“我现在就是一个啃老族。”现在他基本没有收入来源，稿费也越来越少。有朋友愿意帮助他，在浙江、吉林，希望能为他谋得一份工作，等他把材料寄过去，一番折腾之后，最后不了了之，没有下文。

他姐姐让他去申请每月三百多块的低保，也没有成功，因为他没有档案。他出国之后，已经找不到档案了，相关部门让他去“合理上访”。

徐星说他不会去上访的，他觉得自己内心的骄傲不能受到伤害。其实，他从小到大都是为自己内心的骄傲而活着。拍纪录片如此，写小说也是如此。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不合作者。

这样的艰难生活，徐星有非常郁闷的时候。为了消除郁闷，他就去跟底层的人说话。“我对底层的人很有感情，他们的生活是千姿百态的，特别鲜活。在城市高档社区里生活的人，生活特别苍白，你看见张三就等于看见李四，他们都打高尔夫球，都信佛，都会到庙里捐钱，全都一样。但在底层，卖肉的跟卖萝卜的肯定不一样，我现在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就是去买菜。”

徐星不做菜，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叫了外卖。喝的是一种朋友送给他的意大利烈酒。喝酒的那一刻，你能看到他脸上泛起的愉悦。餐桌上，聊起他1980年代写的小说，他变得兴奋起来。“文革”后，大量被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受到追捧，饱读中西文学的徐星认为那不算什么。“爷写这篇小说就是要让他们看看什么是文学。”

于是，全聚德烤鸭店清洁工徐星写出了《无主题变奏》，由此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1980年代，徐星迅速被全国的文艺青年所知晓。这个无名小卒获得了巨大的名声，这像是一个励志故事的开头。彼时的他也受到了类似今天韩寒所受到的质疑：一个刚从“文革”走过来的文学小青年，怎么可能在1981年就写出了充满现代主义气息的小说呢？

今天，徐星成为韩寒的反对者，他认为“韩三篇”会给年轻人带来很大的误导。他倒不认为方舟子是对的。“我不喜欢方舟子，我不喜欢科学，对19世纪的马车夫来说，蒸气机肯定是伪科学，科学标准应该是发展的。”他只是觉得韩寒凭其文学水准不应该获得今天的地位，“偶像应该破除”，他认为，对于那些哼哼唧唧码字而百投不中、连退稿都拿不到的文学青年来说，拿着上千万广告代言费的韩寒炫耀这样的成功“是不公平的”。

许多人问徐星，你这么早就出名，怎么就没换来财富呢？徐星反问，你倒是告诉我怎么换？在1980年代，连“市场经济”的概念都还没有。

徐星一直没钱，也不热衷于赚钱，他希望按照自己内心的自由原则去生活。他最怀念的是在全聚德做清洁工的日子，轻松、收入稳定。他现在对生活的要求极低，“我只需要满足最低程度的日常开销就行了。”

□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

~~~~~

【前朝旧事】

纪登奎夫人王纯谈文革

• 秋石客 •

今年九月（指2011年）我在京参加纪念毛主席忌日活动前一天，我会见朋友徐海亮时，才得知纪登奎的夫人王纯离开人世，虽然我知道她有许多病，享年89岁已不容易，但我还是很难过。

笔者与王纯见过两面并深谈过三个小时，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是知道党内不少机密并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人。她与我谈话的内容她嘱我生前不得公开，如今她已仙逝，我写此文纪念这位老革命。

她住在北京一个历史名人故居中，室内字画不少，多是她本人的大作，我是带着问题有备见王纯的，她很健谈，没有拒绝。

在问及她对改革开放看法时，显示了她很机警，她说改革开放当然好了，能说不好吗？我本人就是受益者，当然，从百姓角度看，问题还是有的，社会分化太厉害了呢，腐败成风了呢。我说不同阶级对改革开放观点大不一致，她说很正常，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在问及她对文化革命看法时，她说主席搞文化革命出发点是正确的，他担心资本主义复辟，中共变修，但方式我很不理解，像我这一类老革命，不论红军式、三八式、解放式老同志，绝大多数是拥护毛主席的，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群众整我们？打倒刘少奇很容易，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都会举手拥毛倒刘。我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止是倒刘，他还要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斗你老人家几场，你印象也不深，况且这又不是毛主席的意思，是刘少奇等人为保少数打多数造成的。她说是你说的这样吗？我说是的。

在问及她对刘少奇看法时，她说刘少奇这个人不怎么样，整人有一套。解放战争时他是整我的，左的要命，要不是毛主席晋绥谈话批刘解放了我，我活不到今天，党内许多同志都讨厌刘少奇，刘少奇是毛维护提拔的，他反毛不得人心。

在问及她对林彪看法时，她说林彪会打仗，功亏一篑，死在外国，难脱叛国罪名。

在问及她对周恩来看法时，他说周总理是成熟的政治家，是拥护毛主席和文革的。在周总理晚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在其病重住院去世前，中央发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江青在一九七五年遭到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虽然是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的，却很不正常。因此，一些人怀疑党内一伙人敢于那么干，背后肯定有人称腰，此人就是周恩来。甚至连江青等最高层领导，也对周恩来不放心。周总理频繁同一些人经常见面谈话引起高度关注，以至于江青不得不下令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以防不测。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谈些什么，江青等人只是猜对了一半。一些

老干部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乘毛主席身体不好，站在他们一边，对江青等采取一些行动，架空主席，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说你们忠不忠于主席我不管，我是忠于到底的，并说了意味深长的话“如主席是装病你们怎么办？”王纯说，还是总理英明呀！

在问及她对康生看法时，她说康生是货真价实的老革命，老纪在他领导下工作，知他很有水平，康生的才华出众，书法顶尖。康生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因此而全面否定康生不公道。

在问及她对江青看法时，她笑了，说我尽提敏感问题。她沉思一会说，江青她们是廉洁的，比如姚文元就老是向我们家借钱花，理由是他经常用私款请上海来京的朋友吃饭，他工资只有七十多元，又不能用公款，所以月月亏空。江青人很漂亮，有才气，生活朴素，衣着讲究大方美观。江青是代毛主席受过，有些文革的大事不能怪她。不过，江青性格反复无常，招人怕，我们背后都叫她老佛爷。她不太会搞团结，得罪人太多了。

在问及邓小平与纪登奎关系时，王纯很激动，说老纪寿命因此大减。江青不满登奎，而邓对老纪也不够意思，起因是主席于一九七五年想考察邓小平，让邓小平写个对文革肯定的文献，邓小平内心不想写，又想过关，所以与老纪商量说他不了解文革全过程，提出让老纪代写，老纪当时没多想就答应了。回家后跟我说此事，我认为不妥，主席知道后不好办。老纪忙了一段，没来得及和老邓说，老邓却来要稿子，老纪对老邓说由他代写稿不合适，主席知道后对我们都不好。邓听后大怒，说老纪滑头，气冲冲的走了，后来主席向邓要稿子，邓借口拒绝了，主席很不高兴。邓小平从此不满老纪，后来逼老纪辞职。

在问及她华国锋的看法时，王纯直摇头，她说老华敢抓江青，一开始我们看好他，结果不是那么回事，能力不行，人品也不行，自私，不敢担责任，老纪挨批的许多事是老华让老纪做的，老华却不表态。当老纪、东兴、吴德、锡联挨整时，他如果坚决顶住，历史就会改写，因为当时政治局多数人如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吴贵贤等多数是会支持华国锋的，华上了当，最后下台是必然的。

在问及她纪登奎是否参与抓江青等人时，她说没有，但抓江青我们是高兴的。主席走后政治要突变我是有感觉的，每天提心吊胆，抓江青后老纪半夜被叫走开会，老纪都和我议了后事，不久老纪回家高兴的抱着我满地打滚，说把老佛爷抓起来了，我也很高兴，如果江青掌权，没我们好果子吃。王纯还讲了抓四人的过程，大意是华国锋、汪东兴首谋，吴德、李先念、叶剑英、吴忠、陈锡联先后入围。当我问及为何采取宫廷政变解决不开会解决时，她说开会不行，江青人多，江青倒是想开全会光明正大解决，没想到老华来阴的。

在问及她最敬佩谁看法时，她毫不犹豫地讲是毛主席、周总理。她说我不讲他们的功德无量，讲两件我终生难忘的生活小事。一件是我们几个女同志听说主席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关心，结伴去看主席，发现是真的，我还亲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确患营养不良浮肿病。当时我们都哭了，说这么大的国家，供主席一天吃一头猪也供得起，为什么不吃肉？主席语重心长地回答说，吃肉我还吃得起，我的工资足够买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国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责任，我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我们听后哭的更厉害了。另一件是我亲眼看见周总理喝玉米糊，吃光了不顾形象用舌头舔饭碗，干净的不用刷碗了！主席、总理去世，百姓如丧父母不是偶然的，毛主席、周总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在问及她对未来的看法时，王纯既担心又抱希望，她说我担心问题多了会积重难返，有亡国危险，但我又相信中共是久经风浪的，只要认真反思，问题再多也能解决，我不相信谁愿成亡国之君。

访谈结束后，笔者久久不能平静，对王纯老人肃然起敬。此文不加评论，除文字有别，内容照实录之，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是非判断。

安息吧，王纯老人，有亿万人民正在关心国家大事，新中国不会亡。

2011、12、1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页：//www.cnd.org /
